

中国古代军事法的特点

人文函大学员 郑需凡



军事法有鲜明的特点,古人早有论断。《司马法》上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就是说治军之法与治国之法有很大差异,不可互用。南宋傅嵩在给高宗的奏议中,更进一步说:“军国异容,刑亦殊制”。那么,“军国异容”,异在什么地方?“刑亦殊制”,殊在哪里?

一、保证统治阶级军事目的实现,确保统治者对军权的掌握是军事法的特定使命

战争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决定国家、政治集团的命运。军队可以支持政治集团夺取国家的统治,也可以使之灭亡。从早期的国家的统治者起,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了军事目的的实现,为了牢固的掌握军权,统治者不仅用军纪,而且还建立了独立的军事法体系。古代刑律的主要使命可以概括为:“定分止争”、“禁暴止邪”。但这八个字却不能概括军事法的使命,不能确切的反映其实质。军事的特殊性使军事法具有特殊使命。夏启就认识到打仗要“用命”,不用命是要吃败仗的,所以他在《甘誓》中把“用命”“不用命”作为赏罚标准。周武懂得打仗是整体力量的决斗,所以他在《牧誓》中把“齐止”作为刑赏标准。司马穰苴认为“后期”会造成军事失利,魏武认为“擅前后左右”会影响胜利,诸葛亮认为“唤名而不应”、“衣服不鲜”、“扶伤举死”也均影响军事使命的达成,所以对这类行为也必须“斩”。至于“乏军兴”、未“正身应役”等,当然也会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自然也是属于军事法应予规范的内容。总之,军事法的使命是保证三军用命、“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一切参予军事任务者都应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些特殊的要求,若用之于非军事活动中,很明显是不适宜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二、对军事法起主要影响作用的不是道德,而是兵法。

法学界公认,中国古代法律主要是受道德观念的影响,如唐律,即是“一本于礼”。这个论断对非军事法来无所谓。用农民的话说:“集体是大草堆,谁不拿谁吃亏”。二是对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认识不清。合同中应该规定发包方有权对承包方的履约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并作相应的惩罚,这类条例实际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它既是发包方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又是承包方抵制和排除发包方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范围之外任意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法律依据。另外,这类合同应大力推行公证制度,使农业承包合同从签订、履行到纠纷的处理都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和程序。目前,乡镇都成立了法律服务所,正是推行农业承包合同公证的有利条件,各地法律服务所应积极把协办公证业务开展起来。

四、应尽快成立农业承包合同的仲裁机构。目前,国内的经济合同纠纷由工商仲裁机构管理,劳务合同纠纷由劳动仲裁机构管理,可是,大量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谁来管理呢?至今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虽然有时经济合同纠纷仲裁机构处理了少量这类合同纠纷案件,但与纠纷的发生率相比只是寥寥无几,大量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久拖不决,只好走上访诉讼之路,甚至出

现告状无门,承包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局面。笔者建议,要尽快地解决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必须建立县、乡(镇)两级农业承包合同的仲裁机构。这个机构最好设在县司法局和乡(镇)司法办公室,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主要的理由是:1.这个部门是县、乡(镇)两级政府的职能机构,可以代表这两级政府处理纠纷;2.这两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指导和调处纠纷的职能;3.该部门人员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较强;4.它便于及时立案,及时调查,及时仲裁,及时执行;5.便于保护生产,它可以代表政府先组织生产,然后边处理、边生产,必要时法律措施和行政措施双管齐下。县乡(镇)两级仲裁机构可以是从属关系,分工负责,可以根据标的额和大小项农业承包合同分级管理。此外,国家要尽快尽早地制定《农业承包合同法》,使这类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解除,违约责任的处理,纠纷的仲裁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和稳定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陈子)

说是非常恰当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确有共同使命,两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但是,这个论断却不完全适合于军事法。不可否认,在调整军人之间、军民之间关系的某些军事法中,有些是受道德观念的影响的。但是在军事法的核心部分——执行军事任务的法规中,却很难找到受道德观念的影响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之中,具有共同使命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却是“兵法”。兵法的理论指导着军事法的建立;兵法中的某些原则补充军事法的不足;兵法中关于法理的论述常常被直接转化为军事法条文;官修的兵法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指导着国家军事法的建立。《司马法》、《尉缭子》的后十二篇、《武侯兵法·七禁》等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军事法,并被后世的军事法所沿袭。汉朝韩信在肖何次律令的同时受命“申军法”,《汉书·艺文志》注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卅五家。”尽管目前无法考知《汉书》本纪说的“韩信申军法”和《汉书》志说的删定兵法书是否是一回事,以及申、定了些什么,但既与“萧何次律令”并提,军法与兵法混用,也就足以说明两者的关系了。宋朝官修的《武经总要》全书都具有法律效力。明朝戚继光奉旨练兵时著的《练兵实纪》,虽未见朝廷对该书有诏示,但因他奉旨练兵,所以该书所列规定,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法规作用。无论兵法、军法,基本上不受道德的约束。《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只要能打胜仗就行。宋襄公的那种“不杀二毛”的道德观,早已被兵家当作笑料,兵法中完全清除了其影响。若硬要说兵法中也受道德的影响,那它就只受“武德”的影响,古代的“武德”,就是夺取胜利,它与一般意义的道德毫无共同之处。

三、重赏、重刑,及时实施,是军事刑法的基本特点。

历代刑名不同,这和社会进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般说奴隶社会的刑法比较残酷,封建社会后期废除了一些前期的酷刑。与同期的刑律相比较,军法的刑名偏少,量刑偏重,定罪程序简单,而且赏、罚并重。从《甘誓》起,就开始了重赏、重刑的先例。“用命赏于祖”,称得起最高奖赏;“弗用命戮于社”,可算得最重的惩罚。进入封建社会后,赏格、刑名分细了,但仍贯穿着重赏重刑的原则。战国时的齐国司马穰苴因监军迟到,当即斩之,秦国非军功不得授爵,斩一首就可受爵。汉李陵在不利条件下降了匈奴,“母、弟、妻、子皆伏诛”。后汉章帝规定“军兴而致缺乏,当死刑也。”《魏武军令》规定:“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武侯兵法·七禁》规定:“唤名而不应”、“衣服不鲜”、“扶伤举死”者皆斩。《隋书·杨素传》说杨素“每监寇,求人过失而斩人。多者万余人。……时称名将。”宋《赏格》中,不但规定了详细的升赏项目,且规定“大捷多获除赏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赏战士。”《罚条》仅58条,却规定了66个斩刑。《大明律·兵律》凡属于军事行动方面的罪名,一般也均定为斩刑。除有通用的赏格以外还有专为某次作战行动定的赏格。总之,不仅立了战功的可以得到官爵财物的赏赐,就是跟着打仗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也可以得到赏赐。反之,造成军事失利的行动必然受到极刑。可能给军事行动带来不利后果的行为,即使未造成恶果,也会被判处斩刑。这种重赏重刑的军法不仅适用于军人,也适用于一切参予执行军事任务的地方官员及民人。甚至还可以扩大到战区内的全体民人。由于军法实行重刑,而且执行程序简单,所以“军法从事”成了斩立决的同义语。

古代统治阶级深知军事是最危险的职业,没有重赏重刑是不可能驱使军民为他效命的,只有同时使用“以赏为表,以刑为里”、“明赏施威”的两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军法采用特殊刑制的原因。

四、门类庞杂,形式多样

由于军事涉及的领域很广,单单有了军队没有马匹、军器、军粮和不断补充军队人员,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军队的任务除了打仗以外,还有禁卫宫廷、保卫边防、守卫关津等。军队要提高战斗力还要进行训练、还要有可据守依托的城池。军事行动要靠明瞭敌情,保守机密,通信顺畅。因此,古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忽视和军事有关的各个方面。并随着统治经验的丰富,不断增订一些新的法规,尽管当时没有军事法这个总概念,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把“誓”、“军法”、“军令”等看作全部军事法,而是尽力使其法律能覆盖军事的各个方面。并且明确指出这类法规属军事性质。例如,管仲“作内政寄军令”,明白说出了其性质属军令性质。“轻过而移。诸甲兵”,明确说明了是为了筹集军器。至于冠以军字的各种法令,自然是属于军事法了。概略区分,古代军事法主要有:(一)历代法典中的军事篇章,如《擅兴》等。(二)历代公开颁行的单行军事法令,如《军令》《军器令》等。(三)只在军内颁行(宋朝明文规定不准民间收藏)的法令,如《步战令》等。(四)被授予专征专杀权的军事长官所颁的法规。这类法规虽然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且时效较短,但在执行中常具有很强的效力。(五)被朝廷正式批准颁行的兵书,如《武经总要》等。

(本文责任编辑:陈子)。